

阿Q新传

○毛玉拴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阿Q新传

毛玉拴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阿 Q 新传/毛玉拴 著.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13. 3

ISBN 978—7—80240—888—8

I. 阿… II. 毛…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1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99108 号

书 名	阿 Q 新传
作 者	毛玉拴
出 版	大众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 100009)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书名题字	张国宏
责任编辑	杨淑萍
封面设计	梁天山
印 刷	河南炫伟印刷厂
开 本	710 × 1010 1/16
字 数	300 千字
印 张	20 印张
印 数	2000 册
版 次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40—888—8
定 价	5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承印厂联系

荒诞的故事 忧患的现实

——漫说《阿Q新传》

田中禾

读了《阿Q新传》的前言和后记，我觉得这是一位忧患意识很重的作者。富于理性思维和逻辑思辨的文笔，与荒诞意味浓厚的书名形成反差，引起我的好奇：他如何把对中国百年历史的严肃思考，转换为谐趣的人物故事？把政论、史论的激情，转化为文学形象？选取文学巨匠笔下的经典人物（一个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在世界拥有广泛影响的人物）来开涮，不免令人担心。

读完全书，感觉作者已经较好地完成了他的愿望。——以反思的心情，回首中国当代革命史；以痛切的感受，展示丑陋的中国人在历史洪流里的表演（不管这表演是主动还是被动，是人欺、自欺还是欺人）。作者选取阿Q作为中国百年历史舞台的主人公，借用这个经典文学形象概括一个民族。中国现当代历史，的确就是由不同层面、不同角色的阿Q主导着。阿Q之所以被当做中国人的化身，不仅仅是此前被许多评论家津津乐道的精神胜利法，精神胜利法只是他所具有的中国人的人性的一个表层，构成阿Q（无论农民还是知识分子）心灵的核心，是奴性。奴

性包含了权力崇拜（对强者的献媚，对弱者的欺凌），极端的利己主义（贪欲、攫夺、阴谋、诡计），对文明的天然的敌视“破”字当头，暴力意识。对人类物质和精神财富的破坏性，对现代文明的抗拒，对美好事物的忌恨和毁坏欲）。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国民劣根性。鲁迅先生说，中国的历史只有两个时代，想做奴隶（才）而不得的时代和做稳了奴隶（才）的时代。这既是对中国历史的概括，也是对中国人的生存状态的概括。阿Q（无论农民或知识分子）的人生就是这样，骨子里是想做稳奴才，现实常常是想做奴才而不得。这样的历史，这样的价值观，直到今天还在继续着。当前中国的现实，官本位仍然是社会价值的核心。官本位造就大大小小的奴才，中国也就仍然由大大小小的阿Q主导着。权力崇拜，极端的利己主义，对文明的敌视，中国国民的劣根性，在追逐金钱、利欲熏心的今天，比鲁迅笔下的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巴尔扎克曾用“信仰崩溃，道德沦丧，人欲横流”这三个短语来形容法国从君主政体向资本主义过渡时期的社会形态，这三个短语，是人类从农耕时代进入商业时代的典型写照。中国正在经历这个社会转型期。现代文明前进的步伐，决定于对阿Q奴性改造的程度。换言之，决定于中国下一代能不能摆脱奴性。

《阿Q新传》为我们勾勒了中国当代史的清晰的轨迹，新中国建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都被阿Q的故事串连起来，寄寓了作者的思考。虽然阿Q这个人物故事是荒诞的，作者所写的历史现实却是严肃的，近于写实。

书写历史，反思历史，是中国老派作者的情结。说老派，是为了与商业写作、娱乐化写作有所区别。进入二十一世纪，享乐主义成为社会的主流，与商业社会步调一致，文学也正在变成消费品，文学的严肃性、责任感日趋没落。中国的主流文学，要么是媚上（所谓的主旋律），要么是媚俗（冲着金钱走），有时二者合流。像毛玉拴这样仍然在老派写作中前行，苦苦思索中国的人性、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化的问题，已经不

讨读者喜欢，没有多少市场。然而，人性、历史与文化，恰恰是文学不衰的主题，是一个民族的精神之所在。娱乐化并不能消解精神的沉重，反而使人更懂得精神的意义。文学的根本价值在于它的悲悯情怀和批判精神，不管《阿Q新传》在艺术上做得如何，起码它的忧患意识和批判精神是可贵的。

毛玉拴用《阿Q新传》来概括中国二十世纪历史，是费了一番苦心了。正如本文开头所说，这样的构思，为作者设置了一个难点：如何把沉重的历史装进一个荒诞人物的故事里？应当说，作者的尝试是有意义的，取得了一定成效。由于他沿着历史的纵向讲述，概括的容量和时间跨度过大，线条未免粗放，给人概述历史的感觉，影响了故事的深度和感染力，削弱了黑色幽默的效果。这为我们带来一个话题：荒诞与写实，抽象与感性，如何转换、交融？恐怕这是二十一世纪纯文学需要讨论的一个大课题。希望玉拴继续探索，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2012年4月于郑州

作者系：原河南省文联副主席、作协主席、著名作家

《阿 Q 新传》序

王士祥

《阿 Q 新传》是我看过最认真的一本小说，不仅逐字逐句，而且对其
中的一些用词和语句还提供了修改建议。全书没有高妙的艺术手法，也
没有玄乎的概念和深奥的理论，风格朴素，文笔平实，把自己的所见所
感通过阿 Q 的经历进行表现。“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作者常用充满
智慧的民间歌谣增加全书的趣味性，不仅使作品显得更加接近下层，同
时也不乏“银瓶乍破水浆迸”的力度美。这是我对这部作品的总体印象。

一、《阿 Q 新传》新在何处

要想说明毛先生笔下的阿 Q，就不能不从鲁迅先生笔下的阿 Q 说起，
毕竟阿 Q 是鲁迅先生原创的人物形象。鲁迅先生曾用喜剧的艺术手法为
“不独是姓名籍贯有些渺茫，连他先前的‘行状’也渺茫”的阿 Q 做了
一篇“正传”，从而使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被“著之竹帛”了。阿 Q
是个小人物，就连他非常看不起的王胡和小 D 都欺负他。在他的身上，
我们忍俊不禁之余感受更多的是自欺欺人的精神胜利法。小而言之，鲁
迅先生让我们看到了地位卑微的阿 Q 在受尽各种压迫之时不得不靠精神
的满足来填补心灵的恐惧和空虚这一悲哀。大而言之，鲁迅先生的目的
主要是借阿 Q 批判当时人们的奴性意识以启迪人们觉醒。阿 Q 的悲哀更

是那个时代同样生活在下层几乎所有人的悲哀。阿 Q 是一面人性的镜子，其中或许也能看到我们的影子。在鲁迅的笔下，阿 Q 没有执着的人生追求，最后还因为被冤枉参与打劫赵太爷家而下狱并被处以死刑。

在《阿 Q 新传》里，阿 Q 又神奇地活了过来，且他在鲁迅笔下的那些精神胜利——得到了实现。在我看来，《阿 Q 新传》之新主要表现在重新活过来的阿 Q 有了新的阅历、新的感悟，被作者赋予了新的意义。鲁迅先生已经让阿 Q 喊出了革命造反的口号，但是“假洋鬼子”拒绝了阿 Q 的革命热情。在新传里，阿 Q 不仅得偿革命的“夙愿”，而且经历丰富，总体来说流过浪，扛过枪，当过领导，经过商，既有平步青云时的得意忘形，也感受到了失势时的落寞和落魄。

没有经历就没有经验，丰富的阅历让阿 Q 在人生浮沉之中变得有了思想性。在不同的人生阶段，他总是在努力使自己价值最大化，可是每一次转折又都带来他深沉的思考。虽然有时候他仍然忘不了自己的精神胜利法，会对陌生人喋喋不休地去炫耀自己的革命往事，甚至会为自己编造一些子虚乌有的荣光，以此赢得敬慕的眼光。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也在用自己的沉思走出精神胜利的范围，把胜利变成了现实。他的思考不再流于表面，而是对深层的体制和传统文化的拷问，哪怕是保全自我的哲学问题，也是和时代紧密联系在一起。

他对基层官场规则有着睿智的认识，“谁对谁错只有那些制造这个怪圈的人才能判断清楚，其余的人只有相互抑杀、诋毁、指责和碰撞，还要去努力地献媚那些怪圈的制造者；”对经济建设中人们精神追求的贫乏有着敏锐的感受，“过去说文化大革命耽误了一代人，我看现在这个社会耽误的不是一代人，这些孩子们，哪个知道孝敬父母长辈？哪个疼爱儿女晚辈？哪个知道艰苦奋斗？哪个知道简朴节约？哪个知道勤劳勇敢？个个都是长着钱心，只顾自己享乐，不管他人死活”。

甚至可以说，阿 Q 在这里成了一个思想者，即便是在自己离婚的时

候，心里还在想着：“吃饱穿暖的中国人是不是进入了精神病高发期？要不然，这些开放发达的地区怎么有那么多不顾年龄悬殊结婚又离婚、离婚又复婚的怪圈？这种婚姻裂变的根源是什么？”所以，“新传”里的阿 Q 已经不完全是原来的形象，他充满了新的时代气息，时刻在审视、思考着社会，从而具有了与时俱进的意义。

二、对阿 Q 的定位

作者在《自序》中称：“我不是在写小说，我是在用小说的形式给国人建立一个行为方式和心灵意识档案，让人们空虚和无聊时去翻阅一下自己记忆不清的心灵轨迹和有生之年忙忙碌碌的挣扎过程。”这句话奠定了《阿 Q 新传》的结构，所以我们看到阿 Q 这一辈子总是处于事业和心灵的挣扎过程中。为了活出尊严，他处心积虑当上了未庄最具权威的农会主席、未庄党支部书记、未庄造反分部指挥、未庄革命委员会主任、公社革命委员会常委、副主任、县革命委员会常委，很多人不得不对他仰视。当仕途走不通的时候，他又携妻南下，从清洁工干起，并在妻子的帮助下荣任玩具厂内勤经理，后来因与妻子离婚成为携巨款返乡的富翁，开始办起了实业。当此之时，县长、书记也把他当成了知己朋友。他的奋斗过程也是心灵挣扎的过程。

从阿 Q 奋斗的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他人性的复杂性。早年在革命的时候为了自保出卖革命，并因此使很多革命者丢掉了性命。但为了获得权力，他又瞒天过海遮掩自己不光彩的过去；当上农会主席之后，他利用职务之便强行和吴妈困了觉；四清时期想方设法向赵司晨夺权；文革时期极力报复钱地主和曾经将自己罢官的老公社书记；身缠百万的时候也常常出入风流场所……他成功时丢掉了自我，为达私利近乎不择手段；受挫时又感到迷茫，在诅咒权力的同时忘记了自己曾经的钻营。在阿 Q 内心的深处，他也有正义和善良的一面，富有之后，他不仅送给邹

七嫂 3000 元让供女儿上学，还扬言要在县城里“盖一所比文山县政府办公楼还漂亮的大楼”，目的是“让那些手里有俩钱有点权就祸害百姓的人看看”，虽然有些炫富的味道，毕竟能让人感受到他的正义。后来在阿 Q 最不得意的时候，兰兰再次回到了他的身边，阿 Q 表现得更加古道热肠，出手阔绰且“不能再提还字”。这时的阿 Q 已经从追求外在的生活形式回到了内心，经历了命运的坎坎坷坷，他终于回归了内心的平静。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正传”里的阿 Q 是一个现实与超现实的组合体。之所以说他现实，是因为他的生活和经历以及内心活动都有现实生活的基础，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并不陌生的；说他超现实是因为在鲁迅先生的笔下阿 Q 已经将近而立之年了，到了“新传”里面却更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我们可以从小说情节中清晰地看到他已经活到了当下，这是一位年逾百岁的老人。其实，不独阿 Q 这样，邹七嫂、王胡、小 D 莫不如此。如果执着于此，就不能理解作者的良苦用心了，因为在作者的笔下，“没有时间和故事的前后逻辑，只是通过不同的历史阶段去反映他的生活意识，和他那不断改变的行为方式”。换句话说，阿 Q 只是一个符号，是完成作者观察、体味、思考社会的载体，他存在于可以存在的时空之中。再套用作者本人的话说，就是“运用人物，形象地把中国近百年来的社会发展以及人们灵魂深处发生的变化寓意揭示，从文化的层面透析理念的变迁”。其实，这也是一种浪漫主义手法的运用。

三、强烈的社会意识

《阿 Q 新传》的最大特点不在于故事情节和人物塑造，而是对社会问题的忧心和思考。无论是与毛先生聊天还是看他写的文字，都能让我想起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与元九书》，其中说：“自登朝以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白居易写这类讽喻诗歌的目的在于“救济人

病，裨补时阙”。这也是传统文学应有的功能，小说也是如此。我们今天用的小说概念和对小说的评价标准，多采用西方的文艺理论。实则，在传统认识中，小说或属史部或属子部，出于稗官，是对正史的补充，有着强烈的社会观照意识。《阿Q新传》就表现出了这种强烈的社会观照意识，比如他在书后“多余的话”中发问：“为什么中国人精神出了问题？为什么这个精神问题又会折射到社会的方方面面，相互影响，恶性循环，致使我们的社会矛盾和精神矛盾产生了如此沉重的沉积？”

《阿Q新传》中关注到的主要是基层社会问题，如官场的腐败、农村劳动力的流失、留守儿童、留守老人、上访问题、商业欺诈、教育问题，就连教材的改革也在其中有所体现。从这些问题可以看到作者对生活观察的仔细，对素材搜罗的用心，而这些问题在农村生活中应该说并不陌生。由于城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劳动力大量流向城市，导致农村问题更加突出，田地里只有老人在勉强经营，村子里除了空荡荡的房子就是没有子女赡养的孤寡老人和缺乏家庭人伦关爱的孩子。留守儿童多存在父母监护教育角色的缺失，甚至虎子连自己的父母是谁都不知道，这样对留守儿童的全面健康成长势必会造成不良影响。“隔代教育”又在客观上造成监护不力，从而产生新的教育问题，这在王胡的家里表现明显。当钱成了大家最显性的追求目标时，所有的文化活动都显得那么地没有魅力，人们在金钱的驱使下对集市上的文化活动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宁愿在麻将桌边“为了几元钱吵得面红耳赤”，甚至不惜“把死去的祖宗们放在誓言里当赌注”。

四、教育的魅力

由于一切以钱为终极的追求目标，所以在不少人的心目中就出现了读书无用论，那些丢掉老人和孩子走南闯北去挣钱的人也为这种理论提供了最直接的论据。跟着阿Q和兰兰生活的邹七嫂的孙子虎子受到了这

种思想的影响。虎子的这种思想受到阿 Q 和兰兰严肃地批评，阿 Q 结合着自己的经历，认为“没有知识，打工也没人要”，“现在不上学，将来想学知识、学技术就已经晚了”。这是一种朴素的认识，也是阿 Q 生命历程中的教训，因为他在和兰兰去南方下海的时候已经经历了被淘汰的尴尬。

阿 Q 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正规的教育，这在他看来是很多事情失败的重要原因。当他感到自己没有和时代同步、对形势认识不足时，他想到了上学；当他有财力时，他想到了办学；在邻居们孩子上学问题上，他从不含糊，总能慷慨解囊。因为在他心目中，教育不仅是对知识技能的学习，也是对传统文化和中国几千年人文精神的传承，这是一个民族屹立于世界的精神源泉。

阿 Q 和兰兰对教育改变人的素质寄予很大的希望，所以他们鼓励三胖继续读书，并许诺承担所有的费用。也是出于对教育的厚望，他们在送虎子到大学报到的时候约请了高教授。高教授的宏论为阿 Q 夫妇解了惑：“我们这个民族是活精神的，虽然改革几十年后，人们富有了，生活条件发生了质的变化，社会也从原来的单一走向了多元，但是我们国人没有思想准备，也就是说这种多元的生活没有了文化基础，人们失去了精神支柱，社会形成了精神病状态。”这就是教育带给高教授的洞察问题的能力和魅力，当然从高教授的忧心中也让人感受到了教育在社会建设中的重大责任。

关于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高教授根据多年的经验认为，阔绰、奢侈的孩子多是一些事业的失败者，大凡有成就的青年，多是生活在并不富裕的家庭。高教授之所以有这样的认识，理由很简单，“金钱富有产生了荒淫奢侈，意识危机产生了道德缺失，法无刚性产生了罪恶充盈，生活糜烂产生了信念恐慌，科技进步产生了主观懒惰。这些都给我们这一代孩子的成长造成了不良的心理障碍。因此，如果我们稍不留神，对现

代孩子的培养就会归于失败”。这是经济建设中物质追求和精神追求的矛盾，也是每一个家长不得不面对的孩子教育问题。在作品的结尾，高教授这一理论的预见性得到了证实，虎子因为阿 Q 和兰兰提供的优厚生活条件，整天“热衷于玩电脑和手机，聊天、炒股、游戏无所不能。在寝室常常通宵达旦，课堂上困顿睡觉，学习成绩一天不如一天”，最后还因为同学不小心弄坏他的电脑发生了矛盾，导致了同学的失踪。这里也揭示出了教育中存在的另一个问题，因为家庭条件的差异，资源分布的不均衡，造成了不同环境中成长的学生具有了不同的心理承受能力。

总之，这是一部体现民间知识分子社会责任感和文人良心的作品。作者虽然没有鲁迅先生那样高妙的艺术手法，但表现出了与鲁迅先生同样的对社会观照的精神，作用自然也是期待达到社会道德教育了。

2012年4月8日

作者系：郑州大学文学院文学博士、历史学博士后

尘世中，有一种机缘叫“读懂”

——评毛玉拴长篇小说《阿Q新传》

张佳惠

这大抵可视为一篇多余的评论，原因有二，其一，我与作者毛玉拴素昧平生，他是一个业余写作者，而我因为“稻粱谋”的缘故，视野远远无暇关注到中国太多类似的写作者，这实是应令我与诸多同仁汗颜的，却也是无奈的；其二，自从发觉视力日渐退化以来，我已经连“稻粱”都懒得去谋了。对于一个将书本等同于空气、水、食粮的人来说，当阅读和写作从生命中剥离出去，生命势必只剩下一个空壳，尽管我并没有贝多芬那样的天分，仅从个人愉悦的角度来说，这也是极残忍的。但事物总是有好的一面（得感谢多年辩证法的教诲），那就是让我的阅读和写作变得纯粹了起来——为了节省有限的眼力和精力。这样回头一想之后才发现，原来我们多数时候的阅读和写作也许是可有可无的，尽管它并非全无意义。

佛说，人来世上是来结缘的，所谓“婴其鸣矣，求其友声。”动物靠鸣叫来寻求同伴，人类亦然。而写作，无非是一种鸣叫，它最根本的意义也许正在于寂寞的尘世间“求其友声”，于是便有了这篇评论。

记得陈丹青在《笑谈大先生》一书中曾经说过，一部中国文学史，

幸好有个鲁迅撑着，以不至于让中国作家太丢脸。（大意）从瀚若星河的世界经典文学形象的角度来看，阿 Q 无疑是和冉阿让、卡西莫多、克洛德、爱斯梅拉达、安娜·卡列尼娜、葛朗台、哈姆雷特、夏洛克、罗亭等一系列永恒人物形象相并列的。尽管鲁迅的本意是“画出国民的魂灵，以引起疗救的注意”，但事实上，它的实际意义早已远远超越了“国民性”而上升为“普遍的人性”。因此，阿 Q 不仅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当然，他首先是中国的，因为他“很中国”。

当年《阿 Q 正传》一出炉，每个人似乎都从阿 Q 身上照见了自己的影子，不禁令人背地里赧颜甚而至于脊背发冷，这就是经典的力量，它们从诞生的那一刻便注定了永恒。因此，作家比皇帝活得长，好作品比作家活得长，而经典，则是一只“不死鸟”。也因此我总想以最大的善意提醒每一个写作者要当心，因为任何的当代史都必将进入历史，你所敲下的任何一个字必将成为你灵魂的缩影，他们是写给后人看的。

时至今日，先生已离世半个多世纪，与他一再所祈盼的“速朽”相映成趣的恰恰是阿 Q 的日渐被经典化以及“子子孙孙无穷尽也”。这究竟是经典之幸还是国民之不幸？假若先生在世会作何感想？那么，假若阿 Q 在世呢？对接下来的风起云涌的大革命、大剧变、大动荡又会作何反应？

半个多世纪以来，阿 Q 的子孙们日复一日地生存、繁衍、挣扎于这片神奇的土地，而究竟又有谁，又有几人去仔细体悟领会过、读懂过先生的苦心孤诣？诗人李亚伟在 80 年代写的一首《中文系》中赤裸裸地讽刺那些靠在故纸堆里抠腐臭过活的所谓“知识分子”说：他们把 XX 存进银行/吃他的利息。纵观世相，又何尝不是如此？千百年来的皇权压制和愚民洗脑已经使我们习惯了一窝蜂地把某个人推向神坛大肆跪拜，又一窝蜂地把某个人赶下神坛落井下石进行清算，更有甚者靠给神坛泼脏水来获取盛名，而又有几个人真正读懂读通读透另一个人？从另一个侧面，也恰恰说明了在一个“集体癔症”的社会做一个清醒、独立的人是

如何的不易，同时也反衬了“读懂”之稀缺与可贵。

单从这个意义上讲，作者首先是鲁迅的知音，如果先生九泉有知，当引为慰藉。其次，读懂而不迷信，不跪拜，这更需要平等独立的人格精神和挑战权威的勇气。将阿 Q “穿越”到当代，在经历了各种运动风潮之后，阿 Q 将何以堪？阿 Q 或阿 Q 的子孙们是如何来应对这个时代的？当作为阿 Q 后人的读者看到自己的老祖宗的一系列困惑之后又当作何感想？这本身就是一个很类似“先锋”、“实验”或某种“行为艺术”的既有趣又极具挑战性的话题。

我们特殊的历史，特殊的国情导致了我们的民族是一个充斥了太多荒诞剧和闹剧的民族，但阿 Q 式的特殊的“国民性”又使得我们早已将荒诞日常化、模式化，甚至神圣化。就像阿 Q 即使死到临头，在生死簿上画押时，关心的都不是生死而是 0 圆不圆的问题一样，我们许多时候所做的便是正经八百地演练荒诞剧中的小丑角色而丝毫不觉得滑稽、别扭、赧颜并且居然会生发出阿 Q 式的快意和沾沾自喜。这种将荒诞权威化、神圣化的做法不仅使人们失去了正常的是非判断，更要命的是，久而久之，让多数人形成了唯上是从、麻木冷漠的思维定势，这种思维定势也势必大大戕害到一个作家的写作。许多时候我们不难发现，对于诸多写作者而言，能否自觉地杜绝闹剧式写作竟然成了一个道德底线问题，这是多么可悲的事实。但我们或许连悲哀都觉得多余，因为我们早已习惯了各种底线竞争，“杞人忧天”从来都是可笑而不合时宜的。一切皆成习惯。“存在即合理”，这便是中国人对西方哲学的成功歪曲和实用化演绎。先生震聋发聩的反诘再次响起：“从来如此便对吗？”但是集体暗哑，无人回答，行色匆匆的人们都在忙于自保或奔命。我们制造了多少荒诞的文字，我们扮演了多少次小丑，我们就离阿 Q 有多近，我们因此能衡量出与现代文明的距离。所以才有人说，从现代主义的角度来看，中国作家是最缺乏荒诞感的一群。

张爱玲说：“因为懂得，所以慈悲”。而读懂，是难的，因为从内部讲，有赖慧根、灵犀、志趣；从外部讲，有赖机缘、造化、天佑。

因此，在这个寂寞尘世中，“读懂”确是一件不多的幸事。

单就文风而言，我更喜欢前半部分那种古风犹存的叙述，很有些鲁迅的味道，那种节制、调侃和娓娓道来的从容，用先生自嘲的话叫“油滑”，但“油滑”背后凸显的是一种略带悲凉的，清醒的大智慧。